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2026. 5
VOL.19 NO.5

公共行政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行政评论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
(A 刊)核心期刊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10 月 15 日出版　　2026 年第 5 期　总第 113 期

●专栏：公共数据服务

公共数据供给即公共服务：公共数据服务的概念建构、内涵特质与供给模式
…… 郑　磊　杨　涛　1

公共数据服务与社会公平：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检验
…… 常宇菲　何潍涛　刘鲁宁　18

价值期望、调和与共创：公共数据开放服务的价值实现路径
…… 门理想　赵玉攀　张会平　37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多元价值生成：一个公共服务逻辑分析框架
…… 魏　必　孟庆国　范梓腾　56

为避责而模仿：市级政府推动数据开放的动态行为机制
…… 郑跃平　杨学敏　黄源源　张采薇　77

公共数据社会化开发利用能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 秦瑞楠　王新泽　孙宗锋　97

●论文

公众安全感如何塑造政府信任？　…… 李卓轩　王浦劬　118

主体关系、政策企业家策略与乡村振兴创新：一个“风险–绩效”的分析视角

…… 杨巨声　王　清　138

国际公共政策转移的差异化路径及其逻辑：基于“能力–目标”框架的

多案例研究　…… 徐菁媛　杨玢璐　敬乂嘉　159

“隐喻的陷阱”：主题模型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与边界

…… 廖　力　冯乃康　易洪涛　178

●英文目录与摘要 …… 196

国际公共政策转移的差异化路径及其逻辑：基于“能力-目标”框架的多案例研究

徐菁媛　杨玢璐　敬乂嘉*

【摘要】国际公共政策转移是推动全球治理创新、优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实现共同繁荣的关键机制。现有研究虽然对国际公共政策转移路径进行了类型学划分，但多停留在宏观描述，未能深入揭示路径选择背后的深层动因。论文构建“能力-目标”分析框架，选取绿色金融政策、光伏发电政策与生态红线保护政策进行多案例研究，从“政策能力差异性”和“政策目标模糊性”两个维度来分析影响政策转移路径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当政策主体间能力差异较大且政策目标模糊性较弱时，双方倾向于采用操作性强的工具性转移模式；当政策能力差异较大且政策目标模糊性较强时，则倾向于选择注重长期规则和包容性架构的制度性转移模式；当政策能力差异较小且政策目标模糊性较弱时，灵活且成本较低的理念性转移模式更为常见。论文阐释了国际公共政策转移路径差异化选择的内在机制，细化了政策能力与目标模糊性对路径选择的作用条件，通过考察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政策转移实践，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策转移中的行为模式与动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国际公共政策　政策转移　政策能力　政策目标　全球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26）05-0159-19

一、引言

加强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对接，是国际社会凝聚发展共识、实现共同繁荣的关键路径（外交部，2023）。在此过程中，国际政策转移

* 徐菁媛，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杨玢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敬乂嘉，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双碳’目标下地方政府气候政策采纳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7220405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治理体系变革创新的理论与机制”（722340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2025JZDZ046）。

可通过制度协调、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促进多层级发展战略的深度衔接，增强政策协同性并减少国际合作壁垒。近年来，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促进了公共政策的理念、工具、知识，以及制度设计的跨国传播（庄贵阳、周伟铎，2025）。这种多层次的溢出效应正深刻影响接受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国际政策转移不仅是各国提升国际形象、增强制度吸引力与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日益成为其参与全球治理、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手段（胡键，2020）。从学理层面深化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既能为政府在资源约束下的最优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也能使国家利益通过全球治理平台得到有效维护与拓展。

政策转移是指特定政治环境中的政策知识、行政安排、制度和理念被应用于其他政治环境的现象（宋卫清，2008）。国际政策转移侧重于考察该过程在不同主权国家和地区之间如何发生与演进（朱旭峰、王海渊，2012）。既往研究多将国际政策转移视为全球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单向扩散（Dolowitz & Marsh，2000），但随着南方国家能力与影响力的提升，其角色定位已发生显著转变，它们不仅开始积极对外推广自身经验，也成为治理理念、政策模式与话语体系的主动输出者。从政策“输入者”到“输出者”的角色演变，让全球南方国家进入国际公共政策研究视野，也催生了更加多元的政策转移路径。现有研究主要将国际政策转移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制度性政策转移，通过构建新型国际组织和规则体系，推动制度设计、组织架构以及治理经验的转移（庄贵阳、周伟铎，2025）；二是工具性政策转移，涵盖技术、资源、行业标准等层面的“硬性”转移（杨娜，2022）；三是理念性政策转移，通过案例传播、知识共享和文化交流等方式实现理念的转移（田旭、徐秀军，2021）。

那么，影响国际公共政策转移路径选择的因素有哪些？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研究问题。既有文献从强制干预、内生变革及国际制度等维度分析了政策转移的动因（Benson & Jordan，2011；宋卫清，2008），认为国际公共政策转移通常受政策输入方政治制度、资源禀赋及政策变革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然而，这些研究在解释路径选择问题时存在局限性。在类型学层面，既有研究大多将政策转移视为整体性现象，未能就不同政策属性、不同转移路径背后的动因结构进行精细区分，导致分析停留于宏观归纳而缺乏微观机制的解释力。在主体层面，只关注政策输入方或输出方的动机与能力，均难以解释在多元主体互动情境下，路径选择何以呈现差异这一核心问题。在范式层面，由于理论建构长期依托于全球北方国家的政策实践经验，现有分析框架在面对全球南方国家从“接受者”向“输出者”角色转变的现实时，难以有效捕捉以全球南方国家为政策输出方的新型转移路径及其独特逻辑。

鉴于此，本文从政策输出方与输入方的双重视角出发，结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实践，系统分析影响政策转移路径选择的多重因素。本文借鉴政策能力理论与目标模糊性理论，构建“能力-目标”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政策能力差异

性”和“政策目标模糊性”将共同影响政策转移的路径选择。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以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为政策背景，选取绿色金融政策、光伏发电政策与生态红线保护政策三个案例，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模型

（一）国际公共政策转移的路径

公共政策转移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侧重于地方政府间的政策扩散，至20世纪末逐步拓展至跨国层面（Dolowitz & Marsh，2000）。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政策要素在城市与国家间的流动日益频繁，跨境政策学习与治理经验交流随之增强，国家间的政策转移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基于既有文献与实践观察，国际公共政策转移路径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制度性政策转移。该模式通过构建新型国际组织及规则体系，为知识共享与政策学习提供制度载体，推动制度设计、组织架构与治理经验的跨国迁移（庄贵阳、周伟铎，2025）。部分国家为争取潜在成员国或合作伙伴的支持，有选择地输出自身成熟的治理经验与政策模式，为对方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框架，以实现“制度移植”（De Jong et al.，2002）。此外，贸易协定作为制度性转移的重要机制，通过要求缔约方采纳特定政策或制度安排，推动各国在制度设计与治理结构层面的深度协调，以实现互利共赢（史育龙，2024）。

第二，工具性政策转移。该模式涉及技术、资源及行业标准等“硬性”要素的跨境转移（Jones & Newburn，2002）。国际援助合作项目是其典型实践，援助国在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通过技术转让与管理经验输出，提升受援国的经济治理能力（周弘，2023）。以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为例，中国向刚果（布）派遣农业专家团队，提供技术培训与设备支持，协助建立本地农技推广体系（曹文轩，2024）。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标准、灌溉技术及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体系被引入当地，显著提升了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

第三，理念性政策转移。该模式通过案例传播、知识共享与文化交流实现理念输出。在南南合作中，文化与学术交流深化了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文明互鉴与科技协作，为国际合作奠定了共识基础（徐伟忠，2002）。基于共识的转移机制整合了南方国家的集体诉求，通过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形成独特的南南互助范式。该范式突破了传统的单向援助模式，建立了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以非强制方式推动社会资本向制度性权力转化，增强了参与国在国际议程中的话语权（曹德军，2024）。

上述三种路径的类型划分，系统呈现了国际公共政策转移的多元形态，但既有研究关于不同路径选择逻辑及其驱动因素的分析仍显不足。为此，本文将进一步整合政策转移动因的相关文献，探讨动因与路径的关联，以构建对差异化路径

选择机制的系统性解释框架。

（二）国际公共政策转移的动因

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来分析国际政策转移的动因。

第一，外部强制干预视角。该视角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16世纪欧洲殖民扩张时期，当时政策转移主要通过殖民霸权强制推行。此类转移通常表现为外部行为体违背东道国意愿，强行推动宪法、社会或政治制度改革（Dolowitz & Marsh，2000）。据此，政策转移的动因是外部干预，而干预方式及与受干预国的互动关系则是影响其效果的关键。殖民时期的强制转移至今仍对墨西哥、肯尼亚、印度及南非等国的制度建设与政策走向有深远影响（Subrahmanyam，2006）。

第二，国内政策变革视角。该视角将政策转移视为应对国内政策失效与政治环境变迁的主动调适举措，旨在增强执政能力与政治合法性（Ugyel & Daugbjerg，2020）。与外部强制干预不同，该视角强调政策转移主要通过自愿学习与经验借鉴实现，其动因可能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既有政策执行不力引发的公众不满，二是政府更迭、机构调整所催生的新议程，三是政治管理者试图通过政策转移为新决策寻求合法性支撑、提升议题优先级并削弱反对力量等。

第三，国际制度影响视角。该视角认为，政策转移通常发生于国际制度框架中，外部行为体通过设定政策条件或准入标准，引导输入国进行政策调适（谢喆平，2010）。国际组织、全球金融机构、捐助国及跨国公司等主体通过附加政策要求的援助或投资机制，促使输入国调整政策以对接国际规范，从而获取资金支持、投资准入或其他制度收益（刘伟，2012）。

总体而言，传统分析视角或聚焦于政策输入方，或偏重输出方的单边主导，均忽视了过程中的双向互动性。政策转移是从输出国到输入国的动态过程，仅聚焦单一主体无法全面揭示其复杂性。强制性外部干预视角侧重于输出方的主导作用，但该模式在后殖民时代已逐渐式微，难以准确解释当今现实；国内政策变革视角则过于聚焦输入方需求，忽视了输出方的动机与行为。因此，有必要构建整合输出方与输入方双重视角的理论框架，以探讨国际政策转移差异化路径选择的动因。

上述三种分析视角并非彼此孤立，其解释逻辑存在两个交汇点：一是政策能力的差异性。无论缘于外部强制或内生变革，政策转移多表现为能力较弱方向能力较强方的学习，这种非对称性构成了政策转移的重要前提。二是政策目标的趋同性。无论是国家间的横向扩散，还是国际制度向国内的纵向传导，政策转移的关键在于各参与主体的治理目标具备相容性或相似性。据此，政策能力与政策目标可作为解析国际政策转移路径选择的两个核心维度。

（三）理论框架

本文借鉴政策能力理论与目标模糊性理论，以“政策能力”与“政策目标”

为维度构建分析框架，从政策转移双方的视角解析影响转移路径差异的关键因素。

1. 政策能力差异性与政策转移路径

本文借鉴吴逊等（Wu et al.，2015）提出的“政策能力”（Policy Capacity）理论框架来分析政策转移的路径选择。政策能力被定义为“政策执行所必需的技能和资源”，即执行政策所需的能力和竞争力。政策能力可分为分析能力、执行能力和政治能力三类（Capano et al.，2015）。其中，分析能力在组织层面包括获取与处理政策执行所需信息与数据的能力。执行能力关注组织在动员与部署政策实施所需资源方面的有效性。政治能力涉及组织的政治合法性、关键决策者以及公众参与机制（Wu et al.，2015）。上述概念最初是在国内政策执行语境中提出，因此，对政治能力的衡量主要基于国内合法性。但鉴于本文聚焦于国际政策转移情境，我们将政治合法性扩展至国际合法性的范畴。由此，本文提出政策能力差异的三个维度：第一，政策分析能力差异，即政策输出国与输入国在政策信息处理与分析能力上的差距；第二，政策执行能力差异，即双方在执行层面，尤其是在财务资源与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方面的差距；第三，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差异，即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差距。

一方面，政策能力差异影响输出方与输入方的转移意愿。当国家间存在明显的政策能力差异时，较弱的国家通常是“需求驱动型”的政策采纳者。这些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分析能力或资源，难以应对本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不得不寻求外部政策经验和解决方案（Ugyel & Daugbjerg，2020）。引入他国的成功经验有助于缩小治理差距、提升政策能力，特别是在面对复杂治理问题与快速发展压力时，外部政策方案常被视为有效捷径或参考模板。另外，政策能力差异对政策能力较强的国家同样重要。较强国家往往具备更先进的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其政策方案更具吸引力和扩散力（吴志成、刘培东，2020）。在国际规则尚未定型或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有意愿推广其政策模式和治理经验，旨在塑造国际规则、提升影响力及制度性话语权。

另一方面，政策能力差异也间接影响政策转移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传递成本、制度适应成本及各方达成共识的谈判成本等。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经济发达国家通常拥有充足的资金与专业人员，以及更强的信息处理与分析能力，能通过先进的数据工具制定精准政策。然而，一些欠发达国家由于缺乏相关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在吸收和理解外部政策建议时面临困难，这降低了政策信息传递的效率，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2025）。因此，两国在技术能力、经济条件、官僚体系及政治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会增加实施过程的时间与成本，制约政策转移的落实。

因此，政策转移的路径选择需要在各方的转移意愿与政策实施成本之间寻求平衡。当政策主体间的能力差异较大时，政策转移的交易成本随之上升，此时工

具性政策转移往往成为优先选择。工具性政策以技术转让、培训、示范项目及标准应用为主要形式，具有标准化与可操作性特征，主要集中在技术或操作层面，能相对独立于特定制度情境而存在。相较于制度性或理念性政策，工具性政策面临的适配障碍较少，落地难度较低，更易被采纳和实施。此外，由于工具性政策较少触及深层的制度结构或文化价值冲突，政策输出方与输入方的沟通成本降低，信息传递的复杂性由此减弱。与工具性政策转移不同，制度性政策转移面临更为复杂的调适困境。当政策主体间的能力差异较大时，政策输入方作为能力较弱者，转移意愿更高，倾向于借鉴外部成功经验来推动自身制度变革。然而，能力较弱意味着其承接制度移植的适应成本更高，面临如制度调整、文化冲突等结构性障碍（Porto de Oliveira & Pal，2018）。因此，输入方更强的转移意愿客观上要求输出方提供更多支持，以减少适应成本，为政策转移的顺利实施创造条件。

当政策主体间的能力差异较小时，理念性政策转移往往成为优先选择。随着输入方能力与自主性的提升，其与输出方之间的能力差距逐步收窄，政策转移意愿亦相应减弱。在此情境下，相较于涉及深层制度改革、技术调整或治理逻辑重构的“硬性”政策转移，理念性或价值导向型的“软性”政策转移更具吸引力（Benson & Jordan，2011）。软性政策转移具有较高的灵活性、适应性与文化调适性，能较好地跨越制度差异、突破资源限制，转移阻力与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在政策能力相近的国家之间，理念性政策转移成为政策趋同与经验分享中更为常见的路径选择。

2. 政策目标模糊性与政策转移路径

本文进一步引入组织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中的“目标模糊性”概念（王法硕、王如一，2021），探讨其对政策转移路径选择的影响。“政策目标模糊性”可分为三个维度：第一，政策目标难以界定和衡量，且缺乏国际条约赋予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支撑。这将导致各国相对灵活地理解、解读和传达政策，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从而产生较大的理解偏差。第二，目标调整的不确定性，即政策目标缺乏稳定性，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难以有效评估。第三，多元目标下的冲突性，当多个目标并存且缺乏明确的优先顺序时，利益冲突加剧，影响政策的持续性。

当政策目标的模糊性较低时，政策转移成本相对较低。清晰的目标有助于双方准确界定问题边界与内涵，从而为工具性政策转移创造有利条件。以全球生态治理为例，当减排目标被明确为碳排放量下降幅度等可量化指标时，政策输入方可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用的政策工具，如碳交易机制或绿色税收。同时，国际机制所确立的碳排放测量标准具有合法性与权威性，进一步降低了政策沟通与学习成本，使转移过程更加顺畅。此外，目标的可测量性与稳定性有助于推动各方在战略层面达成共识，促进政策理念趋同，这对理念性政策转移尤为重要（Jung，201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所以能够在国家间迅速传播，关键在于其在设计

阶段即嵌入了明确的量化指标体系。这不仅增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也有效减少了政策解读与实施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转移成本。

当政策目标的模糊性较强时，政策转移双方往往难以就问题形成清晰、统一的认识，目标优先级的模糊进一步导致各方诉求难以协调。在此情境下，政策工具或理念可能因适用性受限而难以发挥预期效果，反而为制度性政策转移提供了空间。制度性政策转移侧重于构建长期规则与制度框架，致力于推动政策实施环境的系统性变革，因此具备较强的稳定性。即使短期内政策目标尚不明确，制度框架仍能为政策执行提供规范性与可持续性支撑，从而提升转移效果与长期韧性。此外，制度性政策转移可通过建立对话平台与协商机制，平衡多元利益诉求，提高政策转移效率。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为例，各国在减排目标优先级和责任划分上长期存在显著分歧。在《巴黎协定》谈判初期，全球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减排责任及资金支持等问题上立场迥异，单纯依赖减排工具或技术措施难以凝聚共识（于宏源，2021）。然而，通过构建基于《巴黎协定》所确立的气候谈判平台，以及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机制为核心的全球性制度框架，各国得以根据自身发展水平及能力设定减排目标，并通过协商机制动态调整其目标。这一包容性制度安排在政策目标尚不明确时，有效降低了转移成本，并为各国在动态环境中灵活选择适用的政策工具提供了可能，从而减少了政策实施中的不确定性与冲突，保障了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政策能力差异性与政策目标模糊性这两个自变量彼此不相关。政策能力差异性关注政策转移双方的能力，而政策目标模糊性侧重于政策本身的属性。二者从不同维度共同影响政策转移路径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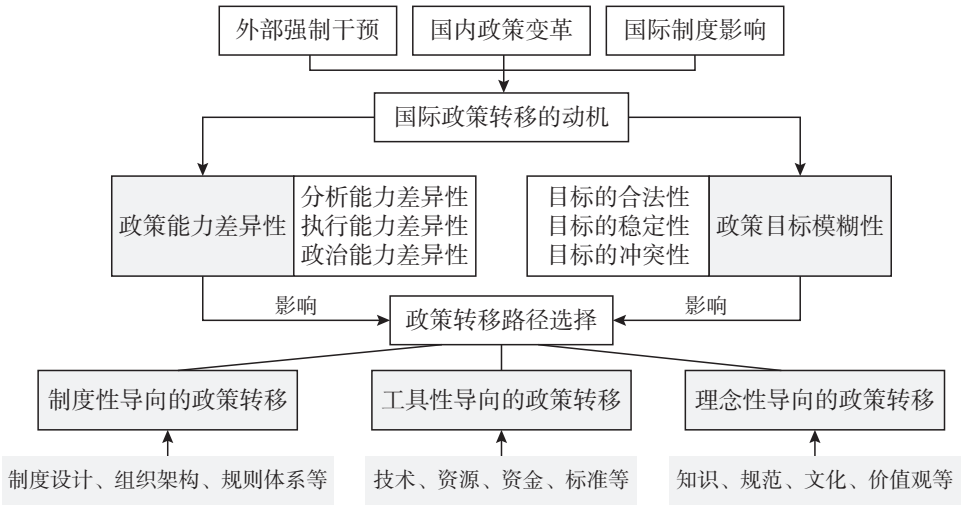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案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作为一项探索性理论研究，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国际政策转移具有较强互动性与情境依赖性，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在具体情境中捕捉路径选择的动态机制。据此，本文选取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三项典型案例：向哈萨克斯坦转移的绿色金融政策，向埃及转移的光伏发电政策，以及向英国转移的生态红线保护政策。三者分别对应制度性、工具性与理念性三类政策转移路径，构成差异化案例组合，有助于系统检验理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资料来源方面，本文收集了政府与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等一手资料，以及学术研究、智库报告和权威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并对两者进行相互印证。上述资料均来源于公开网站与数据库。

本文选择生态治理领域进行案例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第一，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关键地位。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既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与可持续转型的重要力量。中国政策的转型与实施对全球生态格局具有深远影响。第二，中国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实施了碳排放交易、绿色能源投资、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涵盖经济、社会及环境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不仅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模式，也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多元经验与实践样本。第三，中国通过南南生态合作、清洁技术转移和环境发展援助等国际实践，推动国内政策创新与国际规范扩散形成良性互动，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兼具本土适应性与国际可推广性的政策方案。

（一）制度性导向的国际政策转移

1. 绿色“一带一路”推动哈萨克斯坦绿色金融发展

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政策设计与治理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国际合作平台推广至哈萨克斯坦，形成了制度性政策转移。从政策输出方来看，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聚焦资金融通与绿色发展，逐步构建绿色金融制度的国际推广体系。2017年4月，中国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把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列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扩大绿色发展理念与相关制度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于2019年正式成立，它不仅为绿色金融政策搭建了传播平台，还发布了《“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等研究报告，为各类利益相关方提供了行动指南。此外，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于2018年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reen Investment Principle，GIP），涵盖环境信息披露、

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七项原则，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及监管部门参与绿色发展。截至2026年3月，GIP已吸引全球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52个签署方加入。

从政策输入方来看，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首倡之地与中亚枢纽，积极建设绿色金融制度，深度参与绿色“一带一路”进程。为引进外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15年宣布成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AIFC）。AIFC于2018年正式投入运营，其绿色金融中心负责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的绿色金融市场建设与监管。AIFC在“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合作中扮演关键协调角色，其绿色金融中心也是GIP的中亚办事处。截至2026年3月，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等哈萨克斯坦多家核心金融机构签署GIP，推动了“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转型。此外，在构建绿色金融框架的过程中，中国与欧盟的先行经验也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了重要借鉴。

2．政策能力差异较大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政策能力差异，体现在分析、执行与政治三个维度。首先，在分析能力方面，中国已形成较为多元、系统、动态的绿色金融认知与标准体系，而哈萨克斯坦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及起步相对较晚，相关的政策分析体系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自1995年将绿色信贷政策纳入宏观金融监管框架以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2015年前后纳入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保险等多种工具（马骏，2016），2016年出台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供了系统性的规范引导。此外，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及时应对全球形势变化。例如，202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针对优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加强信息披露、强化绿色转型动力、深化国际合作等重要前沿问题做出了研判与指引。哈萨克斯坦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始于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12年底提出的“2050年战略”，次年发布的《哈萨克斯坦向绿色经济转型构想》进一步明确了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利用、产业结构等多领域的绿色转型战略。在AIFC的推动下，哈萨克斯坦绿色金融市场的立法与监管框架初步建立，并体现出一定的动态性。例如，2021年底批准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绿色金融分类目录》于2024年3月重新修订，纳入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优先事项。但哈萨克斯坦在自主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与政策更新方面仍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在执行能力方面，中国依托其庞大的金融体系及多机构协调机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大规模资源动员与政策工具落地，而哈萨克斯坦的绿色金融发展主要依赖AIFC这一制度平台推进，其政策成效相对有限。中国的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规模居全球前列，也形成了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与产业政策相互配合的实施体系，展现出较强的资源整合与政策协同能力。哈萨克斯坦的绿色金融市场起步较晚，首只绿色债券于2020年8月成功发行。截至2025年底，其绿色金融产

品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网络，相应的政策执行主要体现为前期的制度引入与框架搭建，实质性的市场规模扩张并不显著。

最后，在政治能力方面，中哈两国绿色金融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国际影响力层面。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例如，二十国集团的绿色金融合作机制由中国倡导并推动（马骏，2025），展现出较强的议程设置能力与制度外溢潜力。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的绿色金融政策虽在中亚地区发挥着一定的引领作用，但其影响力仍局限在区域层面，对全球绿色金融规则的塑造能力有限，主要体现为对外部规范的吸收与适应。

3．政策目标模糊性较强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都将绿色金融政策纳入了国家长期绿色转型战略，其政策目标既具备一定的稳定性，也不与其他政策目标存在明显的优先级冲突。然而，在全球生态治理领域，绿色金融概念本身缺乏权威及具体的政策目标界定，这导致中哈两国的绿色金融政策目标呈现较强的模糊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工业化发展，欧美国家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民间兴起的绿色环保观念渗透至消费与金融领域，逐渐形成了绿色金融概念，但实务界、学术界及各国际机构、国家等主体对绿色金融的概念界定始终存在一定差异。在全球层面，绿色金融领域虽已建立起一些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例如 1992 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2020 年兴起于亚洲的绿色商业银行联盟以及 GIP 等，绿色金融也得到多边开发银行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但相关政策以原则或倡议为主，并未形成清晰、可量化的全球性绿色金融政策目标与框架。因此，各国在确定绿色金融体系的基准与原则时具有较大灵活性，例如，各国在绿色分类目录（Green Taxonomy）的制定及适用范围上采取了不同方案。

（二）工具性导向的国际政策转移

1．光伏发电政策助力埃及本班光伏产业园建设

中国在光伏发电领域积累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与管理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埃及本班光伏产业园是此类工具性政策转移的典型案例之一。从政策输出国来看，光伏产品、技术与开发经验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共商共建共享方案的重要抓手（新华社，2024a），而地处北非重要位置的埃及正是中国产业链出海布局的关键一环。从政策输入国来看，埃及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管理局（New & Renewable Energy Authority，NREA）基于绿色转型需求，结合本班地处沙漠腹地的日照优势，将本班定位为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关键区域，而作为全球南方国家重要成员并处于全球光伏产业前沿的中国，是埃及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在此背景下，中国光伏政策带来的资金、技术设备与建设经验通过中国企业投入埃及产业园。由于中国光伏产业在设备研发与组装方面具有先进经验，以及相关技术设备存在价格优势，园区一半以上的光伏电站设备与组件来自中国，如光伏面板、逆变器、变压器等。此外，该项目为阿斯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提升了当地的光伏建设能力。随着光伏产业在中东地区的扩展，当地人才的就业竞争力也日益凸显（新华社，2024b）。

2. 政策能力差异较大

与埃及相比，中国在光伏发电领域的政策能力在分析、执行与政治三个维度都展现出更强的实力。在分析能力方面，中国政府能及时依据最新数据调整能源与产业政策，为光伏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引导与政策环境，而埃及的能源政策长期受外部因素制约，其政策分析能力有待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从产业链中游的电池片与电池组件生产进入全球光伏产业，此后长期面临技术落后、原料供应匮乏、市场规模不足等困境。为此，中国政府顺应产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将生产导向型补贴政策调整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标杆电价调整政策。“十四五”规划将光伏列为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的关键增长点（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旨在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埃及虽然早在 1986 年便设立了 NREA，但包括光伏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大多依靠国际援助推进，并未推出系统的能源转型战略。2011 年，埃及政局陷入动荡，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为此，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多次谈判，以能源市场化改革作为条件之一换取贷款。2014 年，埃及开始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2019 年推出的《2035 年综合可持续能源战略》虽体现了埃及吸引光伏领域国际投资的意愿，但其光伏产业与能源政策仍缺乏自主分析与调整的能力。

在执行能力方面，中国光伏政策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下成效显著；而埃及虽然有外资协助，但尚未形成成熟的光伏产业与有效的能源政策。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财政支持，中国光伏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突破了产业链上游的多晶硅制造技术瓶颈，并拓展了下游光伏发电应用的国内市场需求。自 2015 年以来，中国光伏发电装机总量稳居全球首位，从最初技术、市场、设备“三头在外”的被动局面，发展为多领域领跑世界的新能源产业代表（新华社，2024a）。埃及的能源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国际资本，提升了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截至 2019 年，本班园区内已有 32 座太阳能发电厂并入埃及国家电网，总装机容量近 2000 兆瓦。然而，受制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网络与电价分级制度的不完善，资源配置与基层执行能力不足，政策效果仅停留在示范性项目层面，未形成广泛影响。

在政治能力方面，埃及与中国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国际影响力层面，更体现在国内合法性与社会支持层面。中国政府将光伏产业与精准扶贫战略密切结合，光伏发电扶贫政策有效提升了试点区、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Zhang et al.，2020）。

埃及的能源补贴削减政策在IMF贷款条件的影响下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即便在本班光伏产业园等多个大规模太阳能项目落地后，埃及仍然面临电力供应结构性短缺的难题，其能源与光伏产业政策的社会包容性有待提升。

3．政策目标模糊性较弱

光伏发电作为前沿清洁能源技术，在全球气候治理与能源结构转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光伏政策因而内嵌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中。NDC体系将国际层面清晰的宏观政策目标与国内层面各异的微观政策目标统合，既具备权威性与合法性，也避免目标的频繁调整与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国与埃及均深度嵌入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因此两国在光伏发电领域的政策目标模糊性较弱。

具体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巴黎协定》划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在这一宏观政策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和埃及根据本国能力，各自提交了清晰的NDC量化目标，明确了与光伏发电相关的能源与产业政策目标。2015年11月，中国正式明确了到2030年的自主贡献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在15项具体的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还设定了光伏装机目标——到2020年达到1亿千瓦左右（新华社，2015）。2023年6月，埃及政府也提交了明确的NDC目标，以2030年照常情景下的预测排放量为基准，规定了三大部门的具体减排目标：电力部门减少37%，油气部门减少65%，运输部门减少7%。此外，埃及政府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贡献率应提升至42%（Egypt Government，2023）。

（三）理念性导向的国际政策转移

1．生态保护红线影响英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中国推行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发展为国际认可的政策范式，被英国政府认证为"最佳实践"案例（Dudley & Stolton，2022），通过知识共享等软性途径对英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产生影响，是理念性政策转移的理想案例。

从政策输出方来看，在生态文明理念推广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借助多边平台与权威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将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塑造为创新典范。该政策以划定生态功能区与脆弱区为手段，以统筹生态保护与人类经济发展为目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高度认可其价值，并与中国科研机构共同开发了划界工具（NIES，2021）。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案例不仅在2019年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活动中入选全球15个精品案例，也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15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15）上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与认可（新华社，2022）。

从政策输入方来看，英国政府认可生态保护红线政策作为“最佳实践”的地位及其规范性与权威性，验证了知识传播的有效性。2023 年 4 月，由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资助发表的《实现 3030 目标的最佳实践》报告将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列为创新案例，指出了其中值得英国政府借鉴的要点，如兼顾治理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多重政策目标、基于成果的政策评估逻辑，以及灵活的适应性政策调整等（Dudley & Stolton，2022）。因此，中国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在认知与话语层面嵌入了英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政策知识网络，实现了理念性政策转移。

2．政策能力差异较小

中国与英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政策能力各有侧重但整体水平相近，体现在分析、执行与政治三个维度。首先，在分析能力上，中国侧重于战略规划与政策整合，英国则更注重循证决策。自 1994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发布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覆盖濒危物种保护及物种经营利用等多领域的数据系统与监管体系。2010 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明确了优先区域与重点领域，并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通过后对其进行更新。相比之下，英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展现出较强的科研导向。早在 1994 年，英国政府为应对《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发布了《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列出了英国在生物多样性相关科学领域的知识储备与研究基础（UK Government，1994）。此外，英国自 2007 年起持续发布年度生物多样性指标，并在 2025 年更新的行动计划中列出监测指标章节，展现出成熟的数据监测与评估能力。

其次，在执行能力上，中国以顶层设计驱动资源动员，英国则依托立法构建监督保障机制。自 2010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国通过跨部门协作与资源调配，形成了直接保护、防治与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格局，其政策发展正与国土空间规划、前沿信息技术及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协同推进（蔡颖莉等，2024）。相比之下，英国的政策执行模式更强调正式法规的约束与监督。早在 1981 年，英国政府就颁布了《野生动植物和乡村法》，从物种、区域和公共活动等方面规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条款（UK Government，1981），此后在栖息地保护、鸟类保护、海洋保护等多个领域都颁布了正式法律法规。

最后，在政治能力上，中国注重对国际议程的设置与引领，英国则以多元社会参与为重要特征。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科学传统与制度基础虽不具先天优势，但随着国家战略的重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其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与全球影响力不断攀升，如承办 COP15 并牵头推动“昆蒙框架”。英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起步更早，吸引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公众咨询等广泛的社会参与，形成复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

3．政策目标模糊性较弱

与气候治理机制类似，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也通过权威国际条约设定宏观治理目标，并以各国自主递交的行动计划确立微观政策目标，保证政策目标的合法性、稳定性与优先顺序。具体而言，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 CBD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的核心，COP15 第二阶段会议通过的“昆蒙框架”划定了 23 项行动目标，其中包括到 2030 年确保至少 30%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区域得到恢复与保护（即“3030 目标”）。各缔约国应据此修订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并提交至 CBD 秘书处。基于“昆蒙框架”，中国政府于 2024 年 1 月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不仅更新了生态修复目标，也对陆域与海洋的生态红线面积提出了量化要求。英国也在 2025 年 2 月发布以“3030 目标”为核心的新一轮《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相应的量化指标集中体现在国内法律中，例如 2021 年通过的环境法对“生物多样性净增益”所作的规定。

本文基于分析框架，对中国在绿色金融、光伏发电与生态红线保护领域的国际政策转移实践进行考察发现，三类政策转移路径及其影响因素的对应关系如图 2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在第四象限所示的情形中，政策能力相近的国家在缺少明确政策目标时，双方对同一政策领域的理解通常存在差异，进而容易形成本地化特征明显的平行性政策安排，缺乏政策转移的充分动机，有时甚至演化为政策竞争的局面，如中国与欧盟在绿色贸易领域的不同政策取向。中欧双方在环境贸易治理领域的政策能力相当，而该领域处于环境与贸易的交叉地带，尚未形成明确的国际规则与制度框架。2023 年，欧盟颁布《碳边境调节机制条例》，并将其定性为减少碳排放的气候保护措施，而非贸易限制政策，但中方对该条例是否与多边贸易规则兼容持怀疑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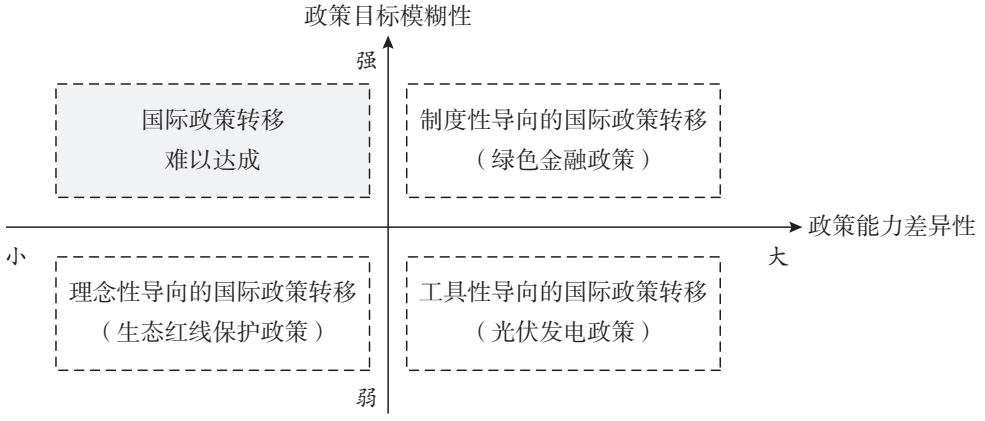


图 2　国际政策转移路径的分析坐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讨论

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凸显了其作为新兴大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其所推动的政策转移也展现出若干特征，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分析。首先，中国的政策转移仍以横向模式为主，即主要在国家之间展开。这里有两方面值得说明。第一，在制度性政策转移过程中，制度规则难以直接在国家之间传递，往往需要政策输出方构建一个能够吸引不同国家参与的“中介平台”。该平台应以专业规范为基础，为各国提供制度性框架，促使其他国家接受并适应这些规则。第二，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在多层级治理体系下，从国家层面向国际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纵向政策转移案例仍较为罕见。但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中，诸如墨西哥的“繁荣计划”、巴西的“参与式预算”以及“家庭补贴计划”等地方政策，在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广下已逐步演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最佳实践”案例，体现了这些国家外交政策的积极性（Porto de Oliveira，2017）。近年来，国际组织已不再仅仅是规范的制定者与自上而下推动标准传播的机制力量，更倾向于主动发掘地方层面的成功实践，并将这些经验制度化为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国际组织在推动全球治理创新中日益增强的制度性力量与中介作用，成为实现地方政策创新向全球模式转变的关键，这有赖于地方政策企业家与国际组织间的紧密合作。尽管本文未对这一模式进行详细探讨，但它却是政策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关注。

其次，政策如何跨越不同文化语境实现本地化，已成为政策转移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的经验表明，这种跨文化适应既要尊重当地制度环境，又要保持核心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例如，中国在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如光伏和风电）时，通过技术适配和能力建设，既输出标准化设备，又为东道国培养本土运维团队，实现从“硬性移植”到“软性融合”的转变。传统上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霸权型”政策转移模式，往往通过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网络传播，并逐步渗透到处于“边缘”地位的全球南方国家。然而，这种模式的跨国界适用性存在固有局限。在实践中，政策往往需要根据各国具体国情进行调整。若忽视目标国家与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尤其是制度语境和治理机制的差异，强行照搬他国成功经验，不仅可能引发“水土不服”，还可能造成政策执行的低效甚至失败。因此，在政策转移过程中重视本地条件的适配性，是实现有效本地化与持续影响的关键。地方政府与政策制定者并非被动接受外来模式，而是通过本土化对其进行再设计与创新，以契合本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政策转移与跨国政策借鉴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涉及多方博弈、制度调适及本地创新的复杂过程。唯有通过灵活的制度适配与跨主体协同合作，才能将外来经验

转化为内生实践，实现本土化。

最后，国际与国内的政策关系是复杂且彼此影响的。向外输出政策实践，不仅有助于塑造国家的国际形象，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及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由此获得的国际认可能够形成反向传导机制，为相关国内政策赋予更强的合法性与政治支持。以光伏产业技术标准输出及生态文明理念传播为代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政策转移实践，不仅为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更通过国际认可反向推动了国内“双碳”目标下的制度创新，从而形成了内外联动、相互促进治理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由此可见，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形成了相互嵌套、彼此影响的多层次结构。面对这一复杂格局，国家需在融入全球政策框架的同时保持制度灵活性，通过动态调整自身政策体系，在实现国内治理目标和参与国际规则塑造之间达成平衡。

五、结论

本文构建“能力-目标”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绿色金融政策、光伏发电政策及生态红线保护政策为案例，从“政策能力差异性”和“政策目标模糊性”两个维度，分析影响国际政策转移路径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当主体间政策能力差异较大且目标模糊性较弱时，工具性政策转移易被采纳；当政策能力差异较大且目标模糊性较强时，政策主体倾向于选择制度性转移模式；当政策能力差异较小且目标模糊性较弱时，理念性转移模式更为常见；而当能力差异较小但目标模糊性较强时，政策转移则难以发生。

本文回应现有国际政策转移研究对转移路径差异及成因关注不足的问题。已有研究虽从强制干预、内生变革及国际制度等多角度切入，但往往只侧重输出国或输入国单方角色，且仍延续以全球北方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分析路径，未能有效解释多元主体互动下政策转移路径选择的差异。本文通过引入政策能力与目标模糊性理论，从输出方与输入方双方的互动关系出发，识别影响转移路径选择的关键变量，弥补现有文献在系统性解释力和分析层次上的局限，为理解不同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策转移中的行为逻辑与动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亦回应了学界关于学科融合的呼吁，致力于推动政策科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整合，弥合两者间的理论与方法鸿沟。政策转移的核心在于促进公共政策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层级间流动，这种跨层级互动将始终是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各国间的政策转移与相互学习，不仅是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表现形式及潜在结果，而且逐渐演变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选择和常态化工具。中国正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厘清国际公共政策转移的机制与效果，对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

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本文尝试探讨不同政策转移路径的影响因素，但对其作用条件的分析有待深化。其一，政策不对称性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在国际政策转移过程中，权力与资源占优的国家难以保持价值中立，这种结构性优势可能导致政策准入机制与适配标准呈现系统性偏差。优势国家的政策范式更易获得跨国移植的制度性通道，而弱势国家的政策方案则面临更高的转移壁垒（Fordham & Asal，2007）。其二，跨国政策合作与竞争的动态机制亦值得深入探讨。国家在政策转移过程中，更倾向于合作、竞争还是对抗？这些外部因素如何影响政策转移的路径与效果？未来的研究若能对这些议题进行更系统的考察，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政策转移的复杂机制。

参考文献

蔡颖莉、朱洪革、李家欣（2024）.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演进、主要措施与发展趋势. 生物多样性，32(5)：25-34.

Cai，Y. L.，Zhu，H. G.，& Li，J. X.（2024）.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Policy Evolution，Main Measur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Biodiversity Science*，32(5)：25-34.（in Chinese）

曹德军（2024）. 大国领导力塑造与中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分析. 东北亚论坛，33(2)：63-78+128.

Cao，D. J.（2024）. Analysis of Great Power Leadership Shaping and the Path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rtheast Asia Forum*，33(2)：63-78+128.（in Chinese）

曹文轩（2024-07-31）. 中非热带农业科技合作持续深化. 人民日报. https：//paper. people. com. cn/rmrb/html/2024-07/31/nw. D110000renmrb_20240731_1-03. htm.

Cao，W. X.（2024，July 31）The Deepening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on Tropical Agricultural S & T. *People's Daily*. https：//paper. people. com. cn/rmrb/html/2024-07/31/nw. D110000renmrb_20240731_1-03. htm.（in Chinese）

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https：//www. ndrc. gov. cnxxgkzcfbghwb202206/P020220601501054858882. pd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2022）.“14th Five-Year”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Plan. https：//www. ndrc. gov. cnxxgkzcfbghwb202206/P020220601501054858882. pdf.（in Chinese）

胡键（2020）. “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国外社会科学，(3)：4-18.

Hu，J.（2020）. The Global Public Goods Fun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Soft Power.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3)：4-18.（in Chinese）

刘伟（2012）. 国际公共政策的扩散机制与路径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4)：40-58+156-157.

Liu，W.（2012）.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4)：40-58+156-157.（in Chinese）

马骏（2016）. 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前景.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6)：25-32.

Ma，J.（2016）. The Evolution of and Prospect for Green Finance in China.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6)：25-32.（in Chinese）

马骏（2025）. 关于我国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发展的若干问题. 新金融，(5)：3-7.

Ma，J.（2025）. Several Issu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and Transitional Finance in China. *New Finance*，(5)：3-7.（in Chinese）

史育龙（2024）. 共建“一带一路”多边合作：进展、挑战与路径. 当代世界，(10)：64-69.

Shi，Y. L.（2024）.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Progress，Challenges，and Paths. *Contemporary World*，(10)：64-69.（in Chinese）

宋卫清（2008）. 国家间公共政策的转移——概念、研究态势和理论. 公共管理学报，(4)：36-45+124.

Song，W. Q.（2008）. Policy Transfer among Nations：Conceptualization，Research Trends and Theory Building.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4)：36-45+124.（in Chinese）

田旭、徐秀军（2021）.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 世界经济与政治，(9)：128-154+159-160.
Tian，X.，& Xu，X. J.（2021）. The Deficit of Global Goods and China's Response.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9)：128-154+159-160.（in Chinese）

外交部（2023-09-13）. 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 https：//www. mfa. gov. cn/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2309/t20230913_11142009. 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2023，September 13）. China's Proposal 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https：//www. mfa. gov. cn/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2309/t20230913_11142009. shtml.（in Chinese）

王法硕、王如一（2021）.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模糊性政策？——基于A市"厕所革命"政策执行过程的个案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18(4)：10-21+166.
Wang，F. S.，& Wang，R. Y.（2021）. How Do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Implement Ambiguous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in the City A.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18(4)：10-21+166.（in Chinese）

吴志成、刘培东（2020）.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国际问题研究，(4)：20-41+138-139.
Wu，Z. C.，& Liu，P. D.（2020）. Global Development Deficit and China's Governance Efforts. *International Studies*，(4)：20-41+138-139.（in Chinese）

谢喆平（2010）.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成员国影响的实证研究. 太平洋学报，18(2)：28-40.
Xie，Z. P.（2010）.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NESCO：A Demonst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 Their Member Countries. *Pacific Journal*，18(2)：28-40.（in Chinese）

新华社（2015-11-18）.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全文）. http：//www. scio. gov. cnxwfbgwyxwbgsxwfbh/wqfbh_2284/2015n_9477/2015n11y19r/xgbd_10116/202207/t20220715_190088. html.
Xinhua News Agency.（2015，November 18）. Enhanced Actions on Climate Change：China's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Full Text）. http：//www. scio. gov. cnxwfbgwyxwbgsxwfbh/wqfbh_2284/2015n_9477/2015n11y19r/xgbd_10116/202207/t20220715_190088. html.（in Chinese）

新华社（2022-12-09）.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https：//www. gov. cn/xinwen/2022-12/09/content_5731106. htm.
Xinhua News Agency.（2022，December 9）. China'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s Provides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Global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https：//www. gov. cn/xinwen/2022-12/09/content_5731106. htm.（in Chinese）

新华社（2024a-03-28）. 领跑全球惠及世界：图说中国光伏产业发展. https：//www. yidaiyilu. gov. cn/p/05DU7I3F. html.
Xinhua News Agency.（2024a，March 28）. Leading the World，Benefiting the World：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hotovoltaic Industry in Pictures. https：//www. yidaiyilu. gov. cn/p/05DU7I3F. html.（in Chinese）

新华社（2024b-12-08）. 中埃携手打造阳光美好生活——访埃及沙漠里的中国光伏企业. https：//www. yidaiyilu. gov. cn/p/0SG2C67L. html.
Xinhua News Agency.（2024b，December 8）. China and Egypt：Crafting a Solar-Powered Brighter Future：A Visit to a Chinese Photovoltaic Company in the Egyptian Desert. https：//www. yidaiyilu. gov. cn/p/0SG2C67L. html.（in Chinese）

徐伟忠（2002）. 全球化条件下的南南合作. 世界经济与政治，(12)：61-66.
Xu，W. Z.（2002）. South-South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lobalization.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12)：61-66.（in Chinese）

杨娜（2022）. 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探讨——兼论中国推动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挑战及路径. 国际政治研究，43(4)：9-30+5.
Yang，N.（2022）. Analyzing the Attributes of Global Public Goods：Challenges and Paths for China to Promote Covid Vaccines as a Global Public Good.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43(4)：9-30+5.（in Chinese）

于宏源（2021）.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太平洋学报，29(2)：1-14.
Yu，H. Y.（2021）. Multi-stakeholder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Process，Motivations and Path Selection. *Pacific Journal*，29(2)：1-14.（in Chinese）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2025-07-30）. UNDESA-CBAS举办系列活动合力推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https：//www. aircas. ac. cn/dtxw/hzjl/202507/t20250730_7899341. html.
Aerospace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25，July 30）. UNDESA-CBAS Hosts Events to Help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chieve the SDGs. https：//www. aircas. ac. cn/dtxw/hzjl/202507/t20250730_7899341. html.（in Chinese）

朱旭峰、王海渊（2012）. 国际组织在政策转移中的作用研究——以UNDP参与中国小额信贷政策为例. 中国行政

管理，(2)：45-49.

Zhu，X. F.，& Wang，H. Y.(2012). Rol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Policy Transfer：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UNDP in the Micro-Credit Policy in China.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2)：45-49.(in Chinese)

庄贵阳、周伟铎(2025). 全球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机遇共享范式——基于中国的理念与实践. 世界经济与政治，(4)：35-57+164-165.

Zhuang，G. Y. & Zhou，W. D.(2025). Opportunity-Sharing Paradigm for Global Ecological Public Goods Supply：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4)：35-57+164-165.(in Chinese)

周弘(2023). 国际援助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一种全球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5)：167-187+208.

Zhou，H.(2023).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Aid：A Glob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5)：167-187+208.(in Chinese)

Benson，D.，& Jordan，A.(2011).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Policy Transfer Research? Dolowitz and Marsh Revisited.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9(3)：366-378.

Capano，G.，Howlett，M.，& Ramesh，M.(2015). Bringing Governments Back in：Governance and Governing in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Research and Practice*，17(4)：311-321.

De Jong，M.，Lalenis，K.，& Mamadouh，V.(Eds.).(200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Experiences with the Transfer of Policy Institutions*. Dordrecht：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 V.

Dolowitz，D. P.，& Marsh，D.(2000). Learning from Abroad：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Policy-Making. *Governance*，13(1)：5-23.

Dudley，N.，& Stolton，S.(Eds.).(2022). *Best Practice in Delivering the 30x30 Target：Protected Areas and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2nd Edition)*. Bristol：Equilibrium Research；Arlington，VA：The Nature Conservancy.

Egypt Government.(2023，June 26). *Egypt's Updat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https：//unfccc. int/sites/default/files/NDC/2023-06/Egypts%20Updated%20First%20Nationally%20Determined%20Contribution%202030%20%28Second%20Update%29. pdf.

Fordham，B. O.，& Asal，V.(2007). Billiard Balls or Snowflakes? Major Power Presti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51(1)：31-52.

Jones T.，& Newburn T.(2002). Learning from Uncle Sam? Exploring US Influences on British Crime Control Policy. *Governance*，15(1)：97-119.

Jung，C. S.(2011). Organizational Goal Ambiguity and Performance：Conceptualization，Measurement，and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14(2)：193-217.

NIES.(2021，December 25). China'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ECR) Was Highly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ttps：//www. nies. org/ywznewsnews/202203/t20220330_1018207. html.

Porto de Oliveira，O.(2017). *International Policy Diffusion an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Ambassadors of Particip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ham：Springer.

Porto de Oliveira，O.，& Pal，L. A.(2018). New Frontiers and Directions in Policy Transfer，Diffusion and Circulation Research：Agents，Spaces，Resistance，and Translation. *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52(2)：199-220.

Subrahmanyam，G.(2006). Ruling Continuities：Colonial Rule，Social Force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British India and Africa.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44(1)：84-117.

Ugyel，L.，& Daugbjerg，C.(2020). Successful Policy Transfer and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 Politics*，48(4)：603-618.

UK Government.(1981). *Wildlife and Countryside Act* 1981. https：//www. legislation. gov. uk/ukpga/1981/69/contents/enacted.

UK Government.(1994). *Biodiversity：The UK Action Plan*. https：//data. jncc. gov. uk/data/cb0ef1c9-2325-4d17-9f87-a5c84fe400bd/UKBAP-BiodiversityActionPlan-1994. pdf.

Wu，X.，Ramesh，M.，& Howlett，M.(2015). Policy Capacity：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olicy Competences and Capabilities. *Policy and Society*，34(3-4)：165-171.

Zhang，H.，Wu，K.，Qiu，Y.，Chan，G.，Wang，S.，Zhou，D.，& Ren，X.(2020). Solar Photovoltaic Interventions Have Reduce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Nature Communication*，11(1969).

责任编辑：岳经纶

英文目录与摘要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9 No. 5, 2026

●SYMPOSIUM: Public Data Services

Public Data Provision as Public Service: Conceptualization, Attributes and Delivery Models of Public Data Services ····· Lei Zheng & Tao Yang

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public data resources deepen, providing public data to society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routine function of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Existing research, however, has largely focused on specific practices, such as open data and authorized operation, without developing an integrative concep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encompasses different service delivery models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ir functional nature. Grounded in China's public data provision practices and drawing on digital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and Data as a Service (DaaS),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that public data provision constitutes a public service and systematically conceptualizes "public data services." These are defined as a new form of public service through which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in fulfilling their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continuously provide society with reusable public data resources and appropriate support for their use, enabling social actors to create value from public data and advance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concept identifies public service as its functional nature, public data as its resource base, and data services as its service content. It also encompasses thre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publicness establishes its normative orientation, accessibility constitutes the conditions for its realization, and value enhancement captures its contribution to generating additional utility.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distinguishes between two service delivery models: inclusive services addressing basic needs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addressing in-depth needs. These two models differ in emphasis while complementing and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By bringing public data provision back into a public service perspective, the paper offers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dvancing, and guiding its practice. It also contributes an indigenous conce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public data governance

Key Words Public Data; Public Service; Data as a Service; Open Data; Authorized Operation

Public Data Services and Social Equity: Evidence from Policy Text Analysis
····· Yufei Chang, Weitao He & Luning Li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have attached growing importance to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data. However, in practice, inequities have arisen, such as insufficient open data supply and the limited ability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authorized data operations. As public data services possess salient public good attributes, their provisio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objective of maximizing public value.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economic value while overlooking equity concerns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Drawing on social equity theory, this study evaluates public data policie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access equity, procedural fairness, quality equity, and outcome equity. Using policy texts from 31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s and 25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n Chinese mainland, a PMC index model is employed to examine hierarchical and regional patterns. The findings reveal disparities in the level of social equity development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Overall, provincial governments outperform those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with procedural justice and outcome equity emerging as two

relatively weak dimensions at both levels of government. Regional disparities are also evident, with eastern China performing relatively better tha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where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remains. Furthermore, a hierarchical pattern of social equity development is observed within both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findings provide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social equity across regions,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value perspective on public data service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equity of service provision.
Key Words Public Data; Public Value; Public Service; Social Equity

Value Expectation, Reconciliation, and Co-Creation: The Path of Value Realization in Open Public Data Services ····· Lixiang Men, Yupan Zhao & Huiping Zha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ublic data services, Open Public Data (OPD)'s value realization path urgently needs to be clarified. This research conducts localized adaptation of the public value theory and carries out full-process tracking of the practice in City A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OPD's value realization process mainly unfolds around value expectations, value reconciliation, and value co-creation among suppliers, governors, and us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ction, value expectations are mainly shaped by goals,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To reach a consensus, data governors usually adopt a combination of measures including rigid, neutral, and flexible approaches to reconcile differences in value expectations. Even if a consensus is reached, the window of value co-creation can only open when usage scenarios, resource bases,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chieve alignment and coupling, and successful value co-creation practices can truly realize data value. This study, to a certain extent, expands the localized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ublic value theory, introduc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value realization in OPD service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log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PD services in China.
Key Words Public Data Service; Open Public Data; Value Expectation; Value Co-Creation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Creation Through Public Data Authorized Operat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Public Service Logic ····· Bi Wei, Qingguo Meng & Ziteng Fa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ode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data factors, public data authorized operations (PDAO) can activate the latent value of public data.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value from public data often faces practical constraints, and the underlying value creation process remains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This study adopts a public service logic perspective to examine PDAO, conceptualizing it as an emerging form of public data service.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representative cities, this study uncovers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data's multi-dimensional value creation throughout the authorized operation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herent features of public data, namely heterogeneity, sensitivity, and perishability, render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a necessary approach to PDAO. High-quality PDAO entails a value-added service process involving co-design, co-production, and integrated usa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which holds and manages public data resources) and enterprises (which operate data resources and manage data products). This process generates multiple forms of value, including value in data governance and literacy enhancement, value-added from direct and indirect exchange, and value for empowering economic and social applications. Drawing on the public service logic perspective, this study develops the framework of "data characteristic-service process-value creation", which helps practitioners move beyond a narrow focus on the monetary value of public data. Instead, it encourages institutional design that is service-driven,

thereby preventing misalignment between data supply and demand expectations and ensuring the sustained release of public data's multi-dimensional value.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 Logic; Public Data; Authorized Operation; Public Service; Value Creation

Imitation for Blame Avoidance: The Dynamics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Advancing Open Government Data ..... Yueping Zheng, Xuemin Yang, Yuanyuan Huang & Caiwei Zhang

Abstract Public data services aim to meet societal actors' data needs through effective data provision. Open government data (OGD) is an important means through which the public sector provides public data services and is also a dynamic process in which governments balance blame risks and adjust their strategies. Drawing on blame-avoidance theory, this study distinguishes two stages of municipal OGD—platform launch and deepening openness—and uses panel data from 282 Chinese cities from 2012 to 2025 to examine how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ffusion affect municipal governments' OGD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platform-launch stage,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ffus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launch of open data platforms, as municipal governments imitate others to reduce the blame risk associated with inaction. At the deepening stage, vertical diffus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openness, whereas horizontal diffusion exhibit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As OGD practices become more widespread, their demonstration and blame-sharing effects weaken, while the blam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eeper openness increase. Municipal governments also adjust their openness toward the average of their provincial peers, with the catching-up effect among lower-performing cities stronger than the downward adjustment among higher-performing cities.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intergovernmental imitation is driven not only by learning or competition, but also by a dynamic trade-off between the blame risks of inaction and action, giving rise to a behavioral logic of "imitation for blame avoidance." This study reveals stage-specific shifts in the logic of blame avoidance as OGD moves from formal adoption to substantive deepening, offering a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diffusion and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and provid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public data openness.
Key Words Public Data Services; Open Government Data; Blame Avoidance; Policy Diffusion; Municipal Government

Can the Socialized Utilization of Public Data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 Ruinan Qin, Xinze Wang & Zongfeng Sun

Abstract The Socialized Utilization of Public Data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expanding the supply of data factors,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factor markets, and accelerating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essence, it constitutes a form of public service. In China, the Socialized Utilization of Public Data is transitioning from a model centered on data openness to a new stage jointly driven by "data openness plus authorized operation". Drawing on policy instrument theory,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data openness and authorized operation as a coercive policy instrument and a market-based policy instrument, respectivel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taggere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actices across localities, the study employ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design to examine their respective effects on local digital-economy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data openness and authorized opera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local digital-econom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effect of data openness remains to be observed, whereas authorized operation generates a sustained positive impact.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data openness and authorized operation produces a synergistic effect: provinces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mix exhibit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economy development than those implementing only one of the two policies. Moreover, the combination

effects of data openness and different models of authorized operation vary considerabl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improv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public data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Data Services; Open Data; Authorized Operation; Digital Economy; Policy Instruments

●ARTICLES

How Does Public Security Shape Government Trust? ····· Zhuoxuan Li & Puqu Wang
Abstract Government trust serves as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Drawing on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public security at two levels: national security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Employing the 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 we reveal a differentiated attributio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public security is transformed into government trust: national security primarily enhances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reas livelihood security mainly contributes to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s, thereby shaping a hierarchical pattern of government trust. Moving beyond a linear objective performance-driven explana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effect of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on government trust,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traits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rust. In addition, social trust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national security on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dicating both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social trust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is effect. By analysing the complex psycholog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ublic security is converted into government trust, this study provides micro-leve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Public Security; Government Trust;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Social Trust; 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

Actor Relations, Policy Entrepreneur'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Risk and Performance" ····· Jusheng Yang & Qing Wang
Abstract Agency-centered theories regard policy entrepreneurs as key actors in overcoming institutional inertia and advancing government innovation. Yet little research has examined how their action strategies are generated o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strategies facilitate innovation.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 Township,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policy entrepreneurs' action strategies are shaped by two sets of actor rel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stakeholders and the innovation, and relations between stakeholders and the policy entrepreneur. The former are structured by the configurations of risk and performance confronti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shape the policy entrepreneur's room for agency, determining whether strategies are pursued proactively or reactively. The latter are structured by power rel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and shape the policy entrepreneur's bargaining space, determining whether strategies operate through negotiation or mobilization. Policy entrepreneurs' action strategies are further governed by a dual goal logic of enhancing performance and reducing risk.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goals and the two sets of actor relations gives rise to eight strategic behaviors: responsiveness (*Xiang Ying*) or risk-sharing (*Fen Tan*), steering (*Qian Yin*) or interpretive justification (*Chan Shi*), compensation (*Fu Xu*) or appeasement (*Ping Xi*), and incentivization (*Qu Ce*) or demonstration (*Shi Fan*). Through these strategies, policy entrepreneurs enhance the payoffs that different stakeholders derive from innovation, thereby securing support, defusing resistance, and facilitating implementation. Moving beyo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n policy change, this article offers a new explanation of policy entrepreneurs' strategic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chronic inter-actor relations, thereby enriching and extending theories of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mobilization, and policy networks.
Key Words Actor Relations; Policy Entrepreneurs; Risk; Perform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and Logic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Transfer: A Multi-Case Study Based on the "Capability-Goal" Framework ..... Jingyuan Xu, Binlu Yang & Yijia Jing
Abstract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transfer is a key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glob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optimizing the supply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achieving shared prosperity.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has classified the pathway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transfer, it often remains at a macro-level description and fails to deeply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behind path selec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apacity-goal' analytical framework, selecting green finance,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and ecological red line protection policies for a multi-case study. It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policy transfer path selection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policy capability differences' and 'policy goal ambigu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when there is a large policy capability difference and weak policy goal ambiguity, parties tend to adopt an instrument-based transfer mode, which is operationally strong and focused on practical tools. When there is a large policy capability difference and strong policy goal ambiguity,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an institution-based transfer mode, which emphasizes long-term rules and inclusive structures. In contrast, when the differences in policy capacity are small and the ambiguity of policy objectives is low, the idea-based transfer mode, which is flexible and cost-effective, becomes more commo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behind the differentiated choice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transfer paths, refine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olicy capability and goal ambiguity influence path selection, and through analyzing China's policy transfer interactions in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patterns and motivations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cy transf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Policy Transfer; Policy Capacity; Policy Goals;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e "Trap of Metaphor": Applications and Boundaries of Topic Models in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Li Liao, Naikang Feng & Hongtao Yi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metaphor 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opic models in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e argue that researchers interpreting model outputs often rely on a "two-stage mapping" process: first, mapping statistical word distributions into "topics," and second, linking these topics to specific theoretical concepts such as agendas, frames, or discourses. When the method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underlying these two mappings are overlooked, researchers risk falling into what we call the "trap of metaphor," thereby und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their conclusion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three typical traps—Generation Bias, Semantic Drift, and Symbol Mismatch—and proposes a validation framework designed to detect and quantify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model outputs and theory-driven coding. Empirical tests on three common types of policy corpora demonstrate that such discrepancies are both significant and systematic. We emphasize that avoiding the trap of metaphor requires researchers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s of topic models, carefully assess their compatibility with theoretical constructs, and adjust their research design accordingly. This stud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logical boundaries of topic model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offer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along with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Topic Modeling; Text Analysis; Methodology; Big Data; Content Analysis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2008年创刊
第19卷，第5期（总第113期）
2026年10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9 No.5
Published in October 2026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 长 肖 滨
主 编 朱亚鹏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传 真 020-84111478
电子邮件 jpachina@163.com 网 址 http://jpa.sysu.edu.cn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邮编510275）
印 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Administra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s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Yapeng Zhu
Tel：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86 20 84111478
Email：jpachina@163.com Website：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Guangzhou,China.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Beijing,China)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代号 国内46-364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20.00元

ISSN 1674-2486